



空间与秩序

——章太炎、刘师培“南北论”之比较

吴 寒

内容提要 “南北”是认识中国地理空间的重要理论视角，也成为现代学术转型中备受瞩目的思想碰撞点。章太炎和刘师培在这一问题上的对话，对现代文学地理学、区域语音学等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其异者观之，章太炎力主“夏楚一体”而“宗南”，尝试以“张楚”挾发文明内部生长的新契机；刘师培极言“音分楚夏”而“宗北”，主张“北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自其同者观之，二人区判南北的根本目的都是在其中植入一个理想秩序，从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内重新凝聚起文明根脉。章、刘的共性在与同时期日本学者的对比中更加明晰，二人间的思想共振也为我们今日理解中国与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 南北；空间秩序；音分楚夏；楚夏一体；华夷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何以分南北？这是关乎中国历史人文之大势的重要议题。南北被梁启超喻为“中国地理之骨相”^[1]——从自然角度，纬度、气候、地形等因素塑造了区域风土人情的差异；从历史角度，政治对峙和民族竞争愈加强化了南北地缘意识。南北是一个老问题，近代以来又有新变。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思想求索中，南北话语模式释放出巨大潜能，既可接续传统，容纳关于中国内部政治态势、民族关系的种种现实考量，亦能与现代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知识结合，将中国的多元性置于世界范围内予以衡量和类比。因此，围绕南北问题的诸多讨论，在 20 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丰富、活跃的思想场域。

其中，刘师培的“南北论”一直备受关注。刘师培于 1905 年发表《南北学派不同论》系列文章，吸收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搭建起系统的南北叙事框架，其中《南北文学不同论》成为现代文学地理学的奠基作品之一。刘氏将中国南北差异从根

本上归因于“山国”与“泽国”造就的不同民性：“山国之地，地土饶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这段“地理一民性”之论纵向贯穿于上古到清代的历史时段，横向则辐射于文学、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等领域，为刘氏“南北论”之枢纽。文中自注称：“此说本之那特经《政治学》诸书。”^[2]《政治学》中译本于 1902 年出版，其中分析地形对于国民性的影响：“生山谷者，其自由之精神坚忍而不拔。生海滨者，其自由之精神锐进而易化。”^[3]刘氏所论应本于此，这也成为学界对其认知渊源的基本认识。

不过较少为人注意的是，在西学这一远源的影响之外，刘氏立说亦受到近源即本土理论资源的启发。而最为重要的刺激来自章太炎。1904 年章太炎《馥书》重订本出版，其中《方言》篇立足南北语音之差异和历史变迁，建构了系统的南北文化理论。比较《方言》和《南北学派不同论》，不难发



现二者之间隐隐的承袭、回应关系。例如，章太炎以语音为基础讨论南北差异，划分十大方言区，刘师培亦以音声之“原初状态”作为讨论南北文学差异的起点，另列十大方言区；章太炎认为南北优势地位消长与水道交通有关，刘师培延续了这一说法；章太炎以徽州、宁国一带地处高原为由，将其列为有别于江南其他区域的独立语音区、学术区，而刘师培亦从地理因素出发，指出吴派虚浮而皖派质实：“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4]“惟徽歙处万山之间，异于东南之泽国，故闻东林之绪论者，咸敦崇礼教，或致知格物，研精殚思，与空谈心性者迥别。”^[5]章、刘的这些认识如出一辙。而在共性之外，二者又隐然呈现针锋相对之势。刘师培明确驳斥章太炎“夏音即楚音”之论，而“夏楚一体”正是章氏“南北论”的要义所在。

章、刘皆为晚清学术舞台上的明星人物，刘师培于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二人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章、刘志趣立场一度投契，曾同为民主革命之干将，却在许多具体理论建构上颇有分歧，最终分道扬镳。透过“南北”这一视角，可以窥见二人学术脉络中的复杂互动及思想共振。因此，本文拟将论题聚焦于两种“南北论”，思考其区别与共性，并将这场思想对话置于晚清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究二人如何通过建构南北叙事体系，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新的时代问题。

二 “夏楚一体”与“宗南”： 章太炎“南北论”的基本取向

20世纪初，受到西学及日本学者的影响，中国学界开始掀起以南北模式解释中国的风潮。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地理大势论》等文，以地理环境为基点历数中国南北相竞之态势。其后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陆续发表，开启中国现代“南北论”之先声。以上三位学者的理论，当今学界已十分熟稔。而较之写作时间更早、影响亦很深远的章太炎的南北学说，目前关注却不够充分。章氏于1900、1901年间创作《方言》，立足时代新变，以别出心裁的南北划

界寄托了对于时局的思考。《方言》开篇感叹：

中国之燕乐，轶世以南曲为安雅。而宛平成都会六百年，趋市朝者习其言，其乐浸隆。今南纪诸倡优，皆效幽、冀为杀伐悲壮矣！^[6]

中国乐曲以南音为优，但由于北方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南人反而竞相学习北音。这番不无痛心的慨叹，奠定了全篇“宗南”的基本取向。颇有意思的是，在对南北的地理划界上，章太炎并未采取“长江流域为南，黄河流域为北”的主流看法，转而强调“夏楚一体”为中国南方，与幽、冀代表的中国北方相抗衡——这是章氏“南北论”最大的特色。

一般来讲，“夏”指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区域，“楚”指江汉一带的荆楚地域。若以地理方位而言，传统习惯往往以“夏”“楚”代指北方和南方，如皇侃言“楚夏音殊、南北语异”^[7]，“音分楚夏”乃是音韵学上描述南北语音差异的惯常说法。而以政治和文化格局来看，夏楚对举亦暗含一层华与夷、文明核心与周边区域相对照的意味。左思《魏都赋》言：“音有楚、夏。”吕向注：“音，人语音也。夏，中国也。”^[8]夏音和楚声的地位并不对等，夏音为中原正声，楚声为地方音调。楚在西周早期为荆蛮之地，作为名义上服从周王室的低等诸侯国，其与周王室的地位一直较为松散，既受到周文化圈的影响，又不安于自己所处的边缘位置。因此在经典记载中，楚国虽对中原政权颇具挑战意识，作出“僭称为王”等举动，但也积极效仿中原文教，融入中原礼乐传统，所以胜郑而不有、围宋而与之平、讨微叔而忧中国。地理意义上的北方与南方，文教意义上的中原与南方，交织为传统“夏楚”关系中的复杂内涵。而章氏所论“夏楚一体”，却力图在中原和荆楚之间划上等号，将其确立为一个种族、语言、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这是颇具颠覆性的理论构想。具体而言，其论证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借助对南音的考辨，论证“夏楚一体”，在理论层面确立“南”的正统地位。章太炎认为，《说苑》载孔子言南音“温和而居中”，为生育之音；北音“湫厉而微末”，为杀伐之音。与北音比起来，进化完具的南音具备毫无疑问的优越性，因



此“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9]。这说明“中声”等同于“南音”，周代“正声”之实质也就是“楚声”。在他看来，荀子言“君子居楚则楚，居夏则夏，居越而越”^[10]，史岑将武王克殷称为“变楚”，夏水亦流经楚地，都印证了楚、夏的一体性。除了文献依据外，章太炎还施展小学功力，通过系联音韵论证“夏楚者，同音而互称”^[11]，“楚”从“疋”声，“疋”为“雅”之古文，“雅”又与“夏”同声，因此“楚”“夏”“雅”皆为一声之转，可以互相假借。

在论证“楚夏一体”的同时，章太炎驳斥了“《诗经》无楚风”的说法。他认为，《诗经》并非因楚国僭称王号而弃楚风，反而将江汉之地的二《南》列于篇首，以亲被文王之化的楚地曲调为整部《诗经》的基础。“二南广之以为‘雅’”，“二雅张之以为‘颂’”，《雅》《颂》皆由《南》推扩而来，所以“四始之声，惟楚夏以为极”，“《诗》三百，皆以楚言为中声”^[12]。或许是觉得此处论证尚有空间，章太炎在《检论》增加《诗终始论》一篇，进一步申明《诗经》“张楚”之义。他认为，《诗经》文本编排始于楚国之二《南》，而时间断限终结于陈灵公株林淫佚之事，陈国之乱最终由楚庄王代表周天子平定。《诗经》时间轴从楚开始又以楚结束，其对楚国的推崇溢于言表：“《诗》之张楚，圣人之情，见乎辞矣。”^[13]

第二，追溯“夏楚一体化”的演进脉络，从而在历史层面确立“南”的正统性。章太炎认为，虽然周代已经以楚声为正声，但周楚真正融合依然经历了漫长过程：“迹江汉之盛，有轮郭于春秋，张于吴、晋，弮于宋，以至今。”^[14]夏楚融合有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其一是春秋时期，楚庄王问鼎中原，楚国成为争夺天下霸权的重要政治力量。其二是东吴经营江汉一带，晋室衣冠南渡，中原与吴楚逐渐翕合无间。其三是宋代熙宁以降，北方黄河决口水道淤塞，而南方江汉之地波沦如故，交通优势促进了南方的发展。在《方言》篇的基础上，《诗终始论》细致回溯了楚音的传承谱系。从《诗经》中的周召之风，到后来的楚汉之音，两汉辞赋皆继承屈原遗风。建安时期曹氏父子、王粲起于南方。晋室南渡后，“中原麋乱，诗乐皆起江左。如河北者，

几无一篇也”^[15]。当中原政治陷入混乱，雅乐失序，仅有楚汉遗声独存江表，中州正声得以一脉不绝。周召之音的传承脉络由周代延续到唐朝，从未受到“夷狄之音”的搅扰，这说明“歌律当以南纪为宗，其道千世而不易也”^[16]。《国故论衡·辨诗》亦有类似说法，认为楚汉之声才是华夏正声，比燕乐更具正统性：“楚汉之声，存于江左，而隋唐谓之清商，隋文以为华夏正声。”^[17]

前文已经提到，南北的主流划分方式是以黄河流域为北方，长江流域为南方。对比而言，章氏所论独树一帜。在其建构的空间格局中，南北界限北移至黄河一线：“河北民性，与河南异，大江不以南北华分焉。”^[18]黄河南北民性迥异，而长江却未形成显著区隔，所以黄河才应是真正的南北天堑，这一构想贯穿于其对方言区的划定之中。章氏将直隶、山东、山西以北划为一区，对应“河朔”；河南、湖北一带划为一区，对应“夏楚”。而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界限，更是文化、族群的严格畛域。章太炎此时是“中华人种西来说”的积极倡导者，他将“西来说”与“南北论”融合，为“张楚”提供了来自文明源头的坚实依据——上古帝王由西方而来，“悉营南服，偏北亦以河水为限”^[19]。盘庚迁殷于北方，因此“朝歌淫乱之德，实与南方芳臭殊”^[20]。周灭殷则意味着南方战胜了北方，是为“变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河朔一带早已沦为夷狄：“夫河朔与虜宾邻，民化其俗，种姓更易，而荆、梁、吴、楚，仍世益盛，非独文学云云也。”^[21]从当下政治来看，区分南北语音更有其现实意义：“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异同为大齐。”^[22]

南北界限同时也是种族界限，章太炎“南北论”中的民族主义色彩不言而喻，“排满”与“宗南”可以说是一体两面。通过将南北界限推至黄河一带，一方面，“北方”被限定于以北平为中心的河朔地带，从地理上呼应“排满”与“攘夷”的主张。另一方面，“南方”被扩大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共同体。楚国融入中原，夏楚间的“华夷”秩序淡化为文明体的内部纠葛，而中原汉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冲突被凸显为真正的“华夷”对峙，由此确立了“南华北夷”的基本空间格局。章太炎曾就



“排满”驳斥康有为：

长素二说，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复援引《春秋》，谓其始外吴、楚，终则等视。不悟荆、扬二域，《禹贡》既列于九州，国土种类，素非异实。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远方隔阂，沦为要荒。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世本》谱系，犹在史官，一日自通于上国，则自复其故名，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23]

康有为认为，《春秋》对吴、楚的态度由排斥逐渐转为接受，这说明夷狄只要积极效仿中原文教，便能够逐渐融入文明内部，因此华夷、满汉之间不必如此泾渭分明，当以文明为基准保持其开放性，“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24]。但章太炎对此表达了激烈抗议。他认为，“夏楚”关系和“汉满”关系有根本不同。楚地和中原使用统一的语言，分享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理所当然属于同一族群，即使发生过争端也只是内部矛盾。因此，楚地与中原都是“华”，真正的“夷”只有北方的满洲。通过将南北界限推至黄河，“南华北夷”在空间格局上得到了印证。从这个意义上讲，章氏“南北论”可以说是其民族革命论所延伸出的一重理论维度。

三 “音分楚夏”与“宗北”： 刘师培“南北论”的立场

章太炎“楚夏一体”说是刘师培提出南北学说的重要背景。刘师培旗帜鲜明地反对章太炎“夏楚一体”的观点，主张必须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划分南北，夏楚分属于北方与南方。《南北学派不同论》由总论、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六部分组成，其中《南北文学不同论》开篇就拉开了对章太炎的全方位攻势。在刘师培看来，南北文学之别由上古贯穿至近世，从根本上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语音分南北。刘师培仿效《方言》开列了十大方言区。章氏主张“夏楚一体”，将河南、湖北一带划为一区。而刘氏划界与之迥殊：他将夏楚拆分开来，河南属于河南、河北方言区，湖北属

于淮南、汉南方言区。陆法言有一个关于南北语音差异的经典说法：“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25]对于这一各有优劣的“公允”判断，章太炎反驳称，从音声本质来看，应该是北音急促激越而南音柔和舒缓。燕赵之音“清急”，是谓“嗽音”；而南音“进化完具”，武昌、汉阳方言“尤啾缓”^[26]。刘师培则言“大抵时愈古则音愈浊，时愈后则音愈清；地愈北则音愈重，地愈南则音亦愈轻”^[27]。以“北”系联“古”，以“南”系联“今”，暗示北方语音的发展历史更加悠久。可见，相比章氏宗南，刘师培的立场趋向宗北。

刘师培认为：“河、济之间，古称中夏，故北音谓之夏声。又谓之雅言。江汉之间，古称荆楚，故南音谓之楚声，或斥为南蛮鸩舌。”^[28]黄河流域为夏声，是通行的雅音正调。江汉之间为楚声，往往被视作蛮夷之音。荀子“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正说明“音分南北”，章太炎以此论证“楚夏一体”是完全错误的：

余杭章氏谓夏音即楚音。不知夏音乃华夏之音，汉族由西方入中国，以黄河附近为根据，故称北方曰华夏，而南方之地则古为荒服，安得被以华夏之称？不得以楚有夏水，而夏、楚音近，遂以夏音即楚音也。章说非是。^[29]

与章氏一样，刘师培也引入了“西来说”这一流行理论。不过二人用法南辕北辙。章以为上古帝王“悉营南服，偏北亦以河水为限”^[30]，以此凸显南方楚地语音一以贯之的优势地位，刘则认为“古帝宅居，皆在黄河南北。厥后战胜苗族，启辟南方”^[31]，强调北方黄河沿岸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区的意义。他认为，汉人从西方进入中国，最初就是以黄河附近为根据地，而此时南方长江流域还只是蛮荒之地，不可称为华夏。夏音和楚音是源与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楚”“夏”“雅”自然不能混为一谈。由此，刘师培在南北、楚夏之间的价值立场愈加清晰，那就是以语音为基础，“夏”毫无疑问地占据着华夏文明核心区域的地位，而楚是在这个中心辐射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地区，文化等级始终落下一层，不能将二者相提并论。

第二，诗文分南北。南北语音差异奠定了文学风格的差异，“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



方迥别”^[32]。具体而言，六艺之《书》《礼》《乐》《易》《春秋》皆为北方文学，只有《诗经》分南北。《诗经》主体部分产生于北方，为北方文学之翘楚；二《南》产生于南方，开启了楚辞之后的南方文学传统。《诗经》中“雅”与“南”的结构编排，被对应于“夏”和“楚”的地理关系：“《鼓钟》篇曰‘以雅以南’，非诗分南北之证欤？”^[33]从文学风格上看，北方之“雅”“夏”偏于质实，南方之“楚”“南”偏于虚无，二《南》和楚辞皆“构造虚词，不标实迹，与二雅迥殊”^[34]。在为章太炎《新方言》所作的《后序》中，刘师培重申了这一观点：“《雅》、《南》之乐析于周诗，夏、楚之言区于荀氏。”^[35]

虽然刘氏并未明言，但“诗分南北”的观点，几乎是对章氏“《诗经》张楚”说的釜底抽薪。章太炎以二《南》为整部《诗经》的基础，由“南”推广而有“雅”“颂”。但对于刘师培而言，作为中国最早的经典，整个六经体系都产生于河洛之地，二《南》的存在只是文王兼牧荆、梁二州而形成的特例，无法撼动《诗经》主体部分的地位，自然也不能反映《诗经》对楚地诗歌的格外推崇。

刘师培“南北文学论”以“言分南北”“音分南北”“诗分南北”层层递进，由方言而语音，由语音而诗歌，以此作为讨论南北文学差异的基础原理。若仅从《南北文学不同论》一篇的主旨出发，这个区分南北方言的“帽子”扣得似乎有些突兀。但若将《方言》与《南北文学不同论》并列观之，则二者呈现出潜在的对话性质，由此可以窥见刘师培之深意。前文已经提到，章太炎主张“夏楚一体”，将南北分界北移至黄河沿线，从而将中原与楚地之间的华夷意味淡化为文明内部升降，而将南方汉族和北方民族凸显为真正的华夷格局。刘师培则从“语音”“诗文”两方面，全面拆解章氏这一理论构想，把南北分界拉回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对峙，将“夏”与“楚”严格区分开来。基于不同的南北空间格局，刘师培设计的“理想秩序”也与章氏迥异，章“宗南”，刘“宗北”，这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解读：

第一，理论层面。刘师培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确立了北方的天然优势。刘师培认为，

南北文化差异源自不同的地理环境，北方多山而土地贫瘠，因此民风崇尚实际；南方多川泽而土壤肥沃，因此民风崇尚虚无。民性由地域特质造就，这也是南北学风、文风、士风差异的根源所在。蹈实之学只会流行于北方，蹈虚之学只会盛行于南方。陈良到北方向孔子学习，但他回到南方之后的弟子依然力主蹈虚之学说，“非孔学不宜于泽国之证哉”^[36]？朱熹虽崇尚北方的实学，然而因其长期生活于南方，学术也沾染了南方气味，“宅居南土，渐摩濡染，易与虚学相融，故立学流入玄虚”^[37]。

在两种不同的地域风格论中，北方之蹈实优于南方之蹈虚。以经学论，北儒实际，喜以训诂说经；南儒夸夸，喜以义理说经。以理学论，北方理学躬行实践，南方心学空谈心性，皆释老别派。“岂非南方之地，民习浮夸，好腾口说，固与北人之身体力行者殊哉”^[38]？以文学论，北方六艺之文严谨平实，南方之文则易流于荒唐谲怪。以考证学论，北人“重经术而略文辞”，南人“饰文词以辅经术”^[39]，北人得其菁英而南人穷其枝叶^[40]。刘师培被誉为扬州学派殿军，但扬州地处长江流域，在这个南北学术格局中难以处理。于是刘氏将考证学之北派与南派替换为“徽扬之学”与“吴越之学”，主张徽扬地处山国，因此学风质实平易；吴越地处泽国，因此学风矜尚文辞。则对扬州学派的尊崇并未跃出“宗北”之立场。

第二，历史层面。刘师培“南北论”隐含“宗北”这一理想秩序，于是历史上南北优势地位之升降，也在这一价值坐标系中得以衡量。“汉族初兴，肇基西土，沿黄河以达北方。故古帝宅居，悉在黄河南北”^[41]。华夏文明的发迹与兴盛，是优秀的汉人种与崇实的山国特征共同造就的。汉人西来，在黄河流域成就了优质文化，作为中国学术基础的六经皆产生于此，崇实、笃行也就是华夏文明的固有特质。由此出发，永嘉南渡以来南方学术发展，北方反而落于其后，则与“宗北”这一理想秩序背道而驰。随着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和汉人南迁，北方虽拥有优势的地理条件，却失去了传承学术的冠带之民；南方虽有大量汉人迁入，但泽国的地理特性只能孕育蹈虚气质的学术。人、地两重关键因素的分离，使得华夏文明远离了它最初生根的土壤，逐



渐丧失原初特质而走向沦落。

在刘师培的论述中，“北”与“古”、“南”与“新”几乎总是缠绕在一起。方言之北方重浊而南方清浅，被解释为“大抵时愈古则音愈浊，时愈后则音愈清”^[42]，北地语音之所以呈现“浊”的特色，是因为这里的语言文化历史更为厚重悠久。北方经术“守东汉经师之家法”而南方“沿魏晋经师之新义”^[43]，北方恪守了更为求实的训诂传统，南方则流行新兴的义理之说。在某种意义上，“北学”就是“古学”，“南学”就是“新学”。以永嘉南渡为关键节点，古学消亡而新学兴起，北学沦落而南学盛行。对章太炎而言，永嘉以来南方文化的逐渐兴盛，是理想秩序的不断实现。而对刘师培而言，历史的发展恰恰是对理想秩序的渐趋背离。所以南学兴盛只是假象，南方学术再怎么占据优势地位，从根本的学术气质上都是蹈虚的，不可能真正赓续华夏文化的正统。北方学术再怎么沦落，这片土地的地理特质也不会改变。因此，要想重振文明，必须从人、地两个方面将“中原”文化主脉树立起来，“攘夷”与“收复失地”缺一不可。

四 差异与共识： 两种“南北论”背后的思想共振

比较《方言》与《南北学派不同论》诸篇章，刘师培几乎是在反驳章太炎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模型。在某种意义上，章太炎《方言》篇的写作，应该视为刘师培“南北论”得以成型的重要刺激因素。章、刘思想之差异，乃是我们把握现代“南北论”发轫的一个关键。两种理论的底色是两种不同的思考“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定位自身的方式。

章太炎“南北论”的要义在于“宗南”和“攘夷”。他以融合“夏”“楚”的方式，将“中”（即华夏文明区）的范围扩大为河洛之地与江汉楚地的结合体，而在地理上将燕赵一带隔绝在文明的发展脉络之外。与一个扩大的“中”对应的是一个更具限定性的“外”。《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44]，如何在华夷之辩的理论架构内理解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否接纳异族作为中原文教的合法继承者，是历史中长期

争议的问题。在“夏楚一体”的问题上，章太炎的观点与胡安国相似。胡安国《春秋传》说解文公九年，“冬，楚子使椒来聘”，认为吴楚乃圣贤之后，它们僭号称王只是“以夏而变于夷”^[45]，所以仍有变回夏的资格，但真正的夷狄是不可能变为夏的。胡安国严守夷夏之大防的立场可以说与章太炎非常接近。

但章氏“夏楚一体”仍有不同于以往“正统论”的大胆立意。在这个“夏楚一体”的“中”的范畴内，“宗南”的理论重心，不是“夏”而是“楚”。无论是《诗经》对楚文化的推崇，还是武昌、汉阳方言“尤咩缓”，抑或中原战乱之后只有南方保存正声。楚文化似乎已经成为这个“楚夏”共同体中真正的主脉和未来的希望。“楚夏”结构重心的偏转非同小可，这意味着章太炎试图在河洛之外，找寻另外一支文化根脉，通过理论重心的调整来挾发文明内部生长的新契机。那么章太炎的“南北论”中俨然分出了三个文化层级——“楚—夏—满”。“张楚”与“排满”成为两极，“夏”反而被“架空”的。这种另起炉灶的方式颇为“离经叛道”，这也是胡安国不可能涉及的理论维度。

在华夏文明遭遇危机的时刻，如何通过内部的理论调整来容纳新义、寻求转机？标举楚文化是章太炎给出的努力方向。这一大胆设想背后，也糅合了章太炎对中国政治格局与地理交通大势的现实考量。《检论》在《方言》文末增加了一段：“右《方言篇》，亡清庚子、辛丑间为之。时念清亡在迹。其后十年，义师亦竟起于武昌。然正音之功，卒未显著。”^[46]《方言》写作于1900、1901年间，彼时庚子之乱引发了北方朝局与社会的剧烈动荡，而南方各督抚则签订协议“东南互保”，章太炎曾于1900年6月致信两广总督李鸿章，建议他“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47]。虽然建议并未得到采纳，但是东南督抚们的尝试无疑震动了当时的知识界，也为他们思考中国的空间格局和未来的政治走势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视角，《方言》中的南北论述亦可能与此相关。除此之外，章氏称武昌可以“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雒，而斥候及燕以为采卫”^[48]，是中国最堪建都的城市。那么不仅楚文化本身孕育着走出文明困境的力量，武昌



也是中国未来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通衢之地，章太炎对楚地寄寓了深厚期望。

而刘师培对章太炎最大的攻击点就在于“夏楚一体”。或许在刘师培看来，当“中”被扩大为“夏”与“楚”的联合体，华夏文化的主脉已不那么清晰。而当“宗南”的重心被放置于“张楚”，无疑更加偏离其真正的主轴。所以刘师培“南北论”的要义，就是要从地理和文明两重意义上，把这个“中心”拉回正轨。地理上的“北方”与“南方”，却映射为文化上的“中心”与“地方”，刘师培屡屡以“中”代指北方河洛一带，例如“并、青、雍、豫，古称中原”^[49]，“中原甲姓，避乱南迁”^[50]，“河、济之间，古称中夏”^[51]，“陈良北学中国”^[52]，“金、元宅夏，文藻黯然。惟遗山之诗，则法少陵，存中州之正声”^[53]。如果说，章太炎更多是以空间重组来凸显“排满”主张，将“南北论”定格于“南华北夷”的方位感受。那么刘师培则更多是在时间脉络上考虑这个问题，通过勾勒“北华南夷”到“北夷南华”的历史变迁轨迹，暗示要想复兴华夏文化，必须让“汉人”扎根“汉土”。

看起来，刘师培“音分楚夏”的主张似乎更接近传统“南北论”的主流看法，但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引入，为其学说增添了一抹现代色彩^[54]。比较刘师培与王夫之的相关论说，可以看到其突破所在。王夫之言：“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藪。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駮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谓南人作相，乱自此始，则南人犹劣于北也。洪、永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而贪忍无良、弑君卖国、结宫禁、附宦寺、事仇讎者，北人为尤酷焉。”^[55]吴楚曾是夷狄后来成为文教中心，燕赵曾是中夏后来却沦为夷狄，这说明“地气”可以随着汉人南迁而“南徙”。确立文教中心的要义在于文明程度的高下之分，它在地理上是灵活、流动的。但在刘师培引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南北架构之内，文教中心被从文明和地理双重意义上共同确立，它牢牢限定于河洛之地，不可能随着人口南迁而移动，更不可能有其他族群通过学习华夏文教而“反客为主”。文明与地理的捆绑，意味着现代“国

族意识”与传统“天下观念”被熔为一炉，“中国”既是一个有着清晰主脉的文明共同体，也是一个有确定边界和辽阔土地的现代民族国家。

由上所述，章、刘“南北论”可谓尖锐对立。而在对立之外，要想深刻把握现代“南北论”的

意义价值，亦需理解二人的异中之同。

章太炎力主“夏楚一体”而“宗南”，刘师培极言“音分楚夏”而“宗北”。看似针锋相对的理论模型，在问题意识及立论初衷上却有深层共性。在南北区判中，二人皆表现出强烈的文化立场：南北之间究竟谁堪为文化正统？南北间优势地位的消长是如何发生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这是章、刘“南北论”背后的共同关切。南北不是地理上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描述，相反，区判南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其中植入一个理想秩序，把作为“中”的正统确立出来。章太炎从语音角度将“夏”与“楚”确立为拥有共同历史语言的同一种族，而将满洲排斥为异族。那么近世北方语音的流行只是暂时现象，“幽、冀之音，其道不久矣”^[56]。刘师培则将河洛之地的文化优势从地理根源上确立下来，那么永嘉南渡以来南方文化的兴盛便只是幻象，华夏文明要想复兴必须回到它起源的土地，同样生发出“攘夷”的强烈意图。虽然章“宗南”，刘“宗北”，但他们都意在提供一种把握“中国”的切要方式。也正因为此，夏、楚成为二人的核心碰撞点。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基本方位感受，可以总结为“中心清晰，边缘模糊”^[57]的天下世界观。传统华夷之辨的理想世界图景，是以文化主脉为基点向外辐射的圈层结构，对内的向心力是向外延伸的基础。虽然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相关讨论表现出开放和封闭的两面性，但总的来说，开放一面始终占据主流^[58]。这意味着华夷之辨的基础是“文野之分”，以多大程度上接续了华夏传统文教为基准。近代以来，这一传统世界观遭遇了巨大挑战，为走出文明困境，章、刘从各自的现实认识出发，在“南北论”中融入了现代地理、种族论内容，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生发，“南北”与“华夷”始终缠绕在一起，通过南北叙事把这个中心和主脉树立出来，是两种“南北论”的共同目的。



对比同时代的日本学者，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章、刘之共性的价值意义。“南北论”在世纪之交的日本学界已率先流行，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多少也受到了域外的启发。但中日学者的探讨各自关联于不同的文化立场和现实政治思考，呈现出不同的展开逻辑。章、刘二人在中国内部考虑南北理论模型，其根本目的在于重新梳理华夏文明的内部根脉；而日本学者站在中国之外考虑中国的南北问题，其基本动机则是安置本国的国民意识。中日学者皆旨在重新阐释南北空间背后的秩序，在字里行间进行着隐秘的缠斗。日本学者的讨论可以划分出两条代表性的进路：

第一种是以关系解构主体，强化南北对抗之关系，消解中华文化之主体性。白鸟库吉 1901 年发表《戎狄对于汉民族的影响》，将中国历史解读为南方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角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南北双方持续内耗，互取糟粕，于是都走向衰败。而日本身处大陆之外，反而能够隔岸观火，吸收亚洲乃至世界之精华，却不消耗于这样的南北冲突，成为独一无二的优秀民族^[59]。“南北二元对抗论”解读模式的特点，在于它几乎是在以“置身事外”的态度，描述“与己无关”的历史发展状态。整个东亚史被还原为动态性的交互机制。比对立双方更重要的，是这个此消彼长与交流融通的关系机理本身，它甚至被扩展为更为普遍的原理，用以解释印度、阿拉伯等文化区域的基础形态。南北竞争的漩涡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东亚史的“轴心推动力”。这样一来，中国只是被动卷入漩涡中的众多势力之一，其内在的主体性和向心力自然也随之消解。将这种“去中心化”的论点与章、刘试图树立起的华夏文明主脉论相比，其文化立场有根本性的差别^[60]。

第二种是认可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但主张日本才是华夏文明的真正继承者。内藤湖南于 1894 年甲午战后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暗示中国文化重心曾由北方转移到江南，未来则将转移到日本。这一解释模式的特点，在于它认同中华文明作为文化轴心的地位，并且将日本置身于这个文化秩序的内部，试图说明中国已经丧失了担纲文脉主轴的能力，日本才是未来能够接过这面文化大旗的力

量。内藤湖南汲取传统“南北论”的理论资源并进行了立场改造，借助于将继承和保留华夏文明的特质作为辨别华夷的基础性标准，为日本的文化地位张目。那么，中国虽然孕育了具备向心力的华夏文明，但轴心的运转却要依靠外力的推动。对比内藤，章、刘“南北论”皆呈现出明确的“在地”特征——华夏文明的主脉不仅仅是从文化上限定的，在地理上也扎根于其生长的土壤，不管是楚地还是河洛之地，这片土地在孕育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塑造了它的原初气质，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不管是向外的拓展，还是应付源源不断的外来挑战，这个核心基因始终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源动力。

综上所述，对于章太炎和刘师培，“南北论”都不是纯粹知识性的理论构想，而是在旧学新知中不断调试以回应时代变局的积极尝试。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内重新凝聚起中华文化的根脉，是章、刘最关键的问题意识。尽管在其表述中，章、刘的部分认识受到时代局限而激进偏颇（如其种族主义及排满论）。但总体来看，相关思考与文化、空间意识合流，兼顾文明的延展性与在地性，提供了理解“中国”的重要方式，亦拓展了在新的世界图景中认识自身的多种可能性。而这种问题意识借由对语音、文学的探讨表达出来并非偶然，言、文作为知识传播与情感交流的基础媒介，近代以来成为我们审视自身、想象过去、凝聚群体的重要思想维度。在这种意义上，章、刘借由言、文论证中国，亦隐隐指明了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重使命——在民族国家的视野之下，通过文学叙事、文学史回顾激发人们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是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把握中国言、文中的南与北，可以成为把握中国的一个充分而要约的抓手。正因为此，《方言》《南北文学不同论》作为最早系统讨论中国南北文学风格差异的专论，其所提供的话题和思维模式在中国现代文论发轫期有着非常关键的思想意义。由这些思考出发，“南北文学论”及其种种变体，绵延于近代以来的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南北论”的研究进路与研究侧重亦在不断调试与变化。毋庸置疑，当今的研究框架相较百年以前更加稳固、全面、细密，但同时，早期讨论中这些充满锐度和张



力的思想维度，却也在更为成熟的框架中被模糊和遮蔽。在这些尘封的记忆中，许多线索仍然值得重新连缀，许多问题仍然值得重新思考。那么，如何“披沙拣金”“缀玉联珠”，是当下正值返本开新之际的我们不可推辞的任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诗经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19CZW010）的阶段研究成果]

[1]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第 937 页，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2] [4] [5] [27] [28] [29] [31] [32] [33] [34] [36] [37] [38] [39] [41] [42] [43] [49] [50] [51] [52]

[53]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 319 页，第 336 页，第 332 页，第 346 页，第 346 页，第 346 页，第 318 页，第 346 页，第 347 页，第 347 页，第 320 页，第 327 页，第 333 页，第 340 页，第 318 页，第 346 页，第 321 页，第 318 页，第 318 页，第 346 页，第 320 页，第 352 页，中西书局 2012 年版。

[3] 那特经：《政治学》，第 5 页，广智书局 1903 年版。

[6] [11] [12] [14] [22] [26] [56] 章太炎：《方言》，《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廋书（重订本）》，第 204 页，第 205 页，第 205 页，第 206 页，第 205 页，第 204—207 页，第 20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7] 皇侃：《论语义疏·自序》，第 2 页，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8] 左思：《魏都赋》，《六臣注文选》卷六，萧统编，李善等注，第 119 页，中华书局 2012 年版。

[9] 刘向：《说苑校证》卷十九，向宗鲁校证，第 508—509 页，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10] 这句引文是将《儒效》与《荣辱》的两句话拼接而成，荀子原义为人在中夏文教熏习中更易成为君子，在楚越之地则反之。章氏将其改写，用以暗示楚、夏、越是一体的。

[13] [15] [16] [18] [19] [20] [21] [30] 章太炎：《诗终始论》，《章太炎全集·第一辑·检论》，第 403 页，第 404 页，第 404 页，第 403 页，第 402 页，第 402 页，第 404 页，第 40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17] 章太炎：《辨诗》，《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订本》，第 27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23]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 17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24]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

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册，第 327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5] 陆法言：《切韵序》，《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张涌泉主编，第 2604 页，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35] 刘师培：《新方言·后序》，《章太炎全集·第一辑·新方言》，第 14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40] 这里反转了《隋书·儒林传》的说法，《隋书》言：“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刘氏反驳称：“今观近儒之学派，则吴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讎，以博闻为主，乃深芜而穷其枝叶者也；徽扬之儒，功在知新，精于考覈，以穷理为归。乃简约而得其菁英者也。”参见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 340 页，中西书局 2012 年版。这里主张作为北学的徽扬之儒才真正得学术之菁华，“宗北”之意可见一斑。

[44]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第 400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45]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十五，第 229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46] 章太炎：《方言》，《章太炎全集·第一辑·检论》，第 49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47] 章太炎：《庚子拳变与粤督书》，《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第 3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48] 章太炎：《宅南》，《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廋书（初订本）》，第 7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54] 参见吴键《“文质”与“南北”：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探析》，《文艺理论研究》2015 年第 6 期。

[55] 王夫之：《思问录·外篇》，第 74 页，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57]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 45 页，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58] 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第 68—69 页，东大图书公司 1998 年版。

[59] 参见王向远《白鸟库吉与日本汉学向东洋学的转变》，《国际汉学》2020 年第 4 期。

[60] 参见黄东兰《作为隐喻的空间——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东洋”“东亚”与“东部欧亚”概念》，《学术月刊》2019 年第 2 期。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

责任编辑：马勤勤